



炎黄文化研究

●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 黄帝陵基金会 ● 炎帝陵基金会 主办
主编 赵德润



NLIC2970863849

大象出版社

十五辑

炎黄文化研究

第十五辑

●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 黄帝陵基金会 ● 炎帝陵基金会 主办

主编 赵德润

大象出版社



NLIC297086384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炎黄文化研究. 第十五辑/赵德润主编.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7-5347-7436-2

I. ①炎… II. ①赵… III. ①中华文化—研究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8139 号

炎黄文化研究 第十五辑

赵德润 主编

出 版 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张向阳
责任校对 张迎宁 张涛杰
装帧设计 王翠云 美 霖
监 制 杨吉哲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省罗兰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1

字 数 41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4.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北一路 30 号

邮政编码 450016 电话 (0371)66781503

编辑委员会

顾问 张岂之 方克立 石兴邦 赵世超 文选德

主任 张文彬 王晓安 石玉珍

副主任 赵德润 薛引娥 邓德芳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震中 邓玲玲 刘宝才 肖云儒 何炳武 张 翀

邵小强 周雪辉 郑万耕 耿相新 曹敬庄 梁 枢

主编 赵德润

副主编 王震中 邵小强 周雪辉

编辑部主任 张 翀

目 录

专 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余敦康\1

炎黄二帝及其时代

中国史前文化中的符号与文字:文字的起源 王震中\7
 《五帝本纪》黄帝“合符釜山”“邑于涿鹿”地望考实 葛英会\48
 试论中国原始农业的渊源之地 梁晋高 常四龙\57
 从神灵的更替看炎黄二系 徐义华\62
 近 30 年炎黄文化研究的成就与展望 高 强\72

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

女真萨满教与金源文化 洪仁怀\83

思潮与学派

为邵雍数学派易学正名 郑万耕\105
 论《春秋公羊传》对社会秩序的追求 郑任钊\110
 清末湖南维新运动中的史学思潮 龙 武\126

文化丛谈

以中为尚的中华文化 孙 兵\139
 苏东坡的跌宕人生与艺术境界 赵德润\151
 关于民营博物馆、美术馆的思考 张 舫\156

文物与考古

殷木考 苏家寅\161
 北京地区唐墓壁画的分期与时代特征 于 璞\176

文献整理与研究

“九流十家”非独指“学派”论

——《汉书·艺文志》之“家”义考兼及“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之不足 林国旺\186

目 录	李靛的学术生涯及其《礼论》的思想内容	王启发\196
--------	--------------------------	---------

中外文化交流

《朝鲜王朝实录》所见李朝对清“北伐论”思想探析	朱昌荣\221
-------------------------------	---------

探索与争鸣

从“南耕”到“东耕”

——先秦至唐天子耤田方位时空变化考	刘 凯\234
-------------------------	---------

试论司马光的德才并举思想	毕 游\260
--------------------	---------

“营丘”之争,终可定论	王守中 徐 霞\274
-------------------	-------------

中华学人

恭三师与辽宋西夏金史研究

——纪念邓广铭先生诞辰 105 周年	张希清\277
--------------------------	---------

周辅成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汪学群\293
---------------------	---------

书评与序跋

《马一浮全集》序	汤一介\302
----------------	---------

《中华岳氏统谱》序	龚延明\308
-----------------	---------

学术访谈

价值普遍主义:合理不合理?

——“中西马”对话实录(三)	牟钟鉴 李德顺等\310
----------------------	--------------

学术动态

黄帝文化研究的新收获

——2012·新郑“炎黄文化研讨会”学术总结	张新斌\323
------------------------------	---------

延续国学“正脉”

——国际《尚书》学会首届年会综述	陈春保 陈良中\327
------------------------	-------------

为诸子学全面复兴而努力

——“先秦诸子暨《子藏》学术研讨会”纪要	李秀华\329
----------------------------	---------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余敦康

今天讲一讲困惑我很多年的一些问题,以此向大家请教。问题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什么?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有没有核心价值观以及一以贯之的道统?问题的由来很长,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百年来一直困惑所有中国人的问题。去年联合国在中国举办世界文明对话——尼山论坛。世界文明不是亨廷顿所谓的“冲突”,各种不同的文明之间应该展开对话。这种论坛前些年在很多国家举行过,后来一些中国精英主张来中国举办。因为伴随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模式”备受世界瞩目,“中国的文化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日益凸显。去年,由联合国发起、中国承办的世界文明对话在华举行。这是件大事,很多文化精英都来筹备。我们应该在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讲讲中国的文化元素。在筹备中,文化精英们,如许嘉璐、邢贲思、赵启正、叶小文、汝信、张岂之、李学勤、牟钟鉴、张立文等,就提出问题:既然我们承办世界文明对话,那么我们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文化到底是什么?吴建民的说法——“我不知道”。“中国文化是什么——中国人说不清楚也听不明白。什么天人合一、儒家文化等,说不清楚。印度、日本、伊斯兰世界的人们都说得清他们的文化是什么,唯独我们说不清楚。”吴建民的话对我震动很大,他说:“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深入思考:‘尼山论坛’的背景下,对于我们中华文化是什么,能不能比较简单地讲清楚?恕我直言,我们现在对外讲的东西,条条多例子少,讲不明白。我们这里存在一个构建主流文化的问题,主流文化是需要几代人下功夫去做的,主流文化没建立起来,中国不可能长治久安。”

2005年,我们举办了一个国学论坛。《光明日报》“国学版”的主编梁枢约我写一篇文章,谈谈对国学论坛的期望。正好当时我看到一本刚翻译到中国的书《我们是谁?》——作者,亨廷顿,一个秉持文明冲突论的学者。他说,星条旗下,我们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清楚美国人是什么,全球化背景下有一个文化认同的问题。过去美国人用四个字母表示:WASP——W,白种人;AS,盎格鲁-撒克

* 2011年9月27日——第二天就是孔子2562年诞辰,再过13天便是辛亥革命百年——机缘殊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思想史室特别邀请到院荣誉学部委员余敦康先生回顾、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百年沉浮。此文根据余敦康先生演讲现场录音整理而成。

逊;P,新教。美国人特别简单,几个字母一拼就是。信仰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白种人因为避难来到朴茨茅斯,成了美国第一批移民。而现在美国白种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特别是新教徒都很少了,有伊斯兰教、旧教……所以很多人不知道美国人是什么,但这个问题特别重要。亨氏提出文明冲突,主要是为了解决21世纪美国人文化认同的问题。亨廷顿有世界眼光,他说,不只美国,英国也如此,爱尔兰已经分裂出去了,苏格兰也不认同(英国),英国只剩下了英格兰;再比如俄罗斯人,到现在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属于东方还是西方;日本人搞不明白自己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日本脱亚入欧带来诸多文化认同问题。所以,“我们是谁”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普遍问题。这个问题在很多国家都存在,特别是在中国,这个问题更突出。

“我们是谁?”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国人都搞不清楚。远的不说,但看五四运动,毛泽东说,我们中国人为了追求现代化,在中国文化中找不到救中国的真理。我们向西方学习,一个是西化,学习西方自由主义,以胡适为代表;一个是俄化,十月炮响给我们带来马列主义。“五四”,我们把中国文化贬得一文不值,因为它没有民主和科学,封建的文化产生不了现代文明。所以,2005年,我应光明日报社之邀,也写了《我们是谁?》。问题转回来,尼山论坛,联合国在中国举办文明对话本想借中国经济腾飞之际,探讨中国模式。中国文化是什么?他们本是来中国取经的,结果连吴建民那样的大知识分子都不知道,而问我,我也不知道。

我们经历过“文革”,“文革”之后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然后我们迎来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当时“文化热”所有的文化现象都有一个主题,就是反思“文革”。中国的文化如何产生了“十年浩劫”?当时权威的说法是这样:李维汉去找邓小平,就说了一句话:中国之所以产生“文革”,就是因为中国有封建流毒,一定要反思封建流毒和传统文化,如果不铲除封建流毒,“文革”的错误还会再犯——收录在《李维汉文集》。80年代“文化热”的主题就是反封建,而封建来自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就是封建主义、宗法主义。所以,当时很多改革就围绕着革除封建流毒展开,这不是一两个人的观点,而是共识。像我们社科院老院长胡绳,还有中央党校的吴江,写了一本书——《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研究》。再如《炎黄春秋》第九期中刘泽华的文章——《我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刘泽华是侯外庐学派的人物),通过“文革”反思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什么?王权主义!其中有很多我很尊敬的人,像《求是》总编辑,当时认为现在提倡国学就是封建专制,就是活着的“文革”。80年代,我们走向现代化建设,还有一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河殇》为代表,《河殇》里讲中国是黄土地的文化,是农业文化,以长城为代表,它是封闭型的。现代文化是蓝色文化,以海洋为代表。一部《河殇》是黄河之殇,中国文化已告终结。在80年代的大学生中,这也是普遍的心态。当时有两种情况:一种以激进的方式反对传统文化,另一种以改革的方式反对传统文化,这是受“五四”的影

响,很像当时的李大钊和胡适。为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必须找一个德先生和赛先生,而我们的传统文化恰恰没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因为经过“六四”,便开始了反思,首先从北京大学开始。像季羨林,开始提倡国学,当时有篇文章《国学:悄然在燕园兴起》。季羨林、张岱年等很多老先生开始讲不要一味地西化,应该回归国学,当时兴起了短暂的“国学热”。但是为了改革开放不能提倡国学,这是党的理论权威胡绳的观点。他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反对国学。我当时在孔子基金会做事,也写了篇文章,和胡绳针锋相对。当时研究现代化的专家罗荣渠提出,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所以在现代化过程中国学还是有用的。我之所以反对胡绳是因为当时国学是不是阻碍现代化还没有定论。

国学真正复兴是始于十六届四中全会,当时中国经济已经腾飞,并且顺利渡过了东亚的金融危机。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时候了,我们已经取得了政权,所以在理论指向上应该由斗争转向和谐。建设和谐社会,第一次在党的历史上提出来。十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文化界很多精英发表了《甲申宣言》,包括季羨林、任继愈、许嘉璐等。2004年是甲申年,这是一个转折点。宣言指出,中国文化到了复兴的时候了。自“五四”以来,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反传统搞西化,再到90年代反国学,国学一直没有起来,直到2004年我们党把文化复兴抬出来。但从2004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反国学的声音。有一本《国学问题争论集》,里面反对国学的人很多,像刘泽华、袁伟时,甚至李泽厚也反对。所以经过这样一番局面之后,吴建民说,他不清楚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

所以“世界文明对话”我始终找不到“来自中国的声音”,各派之间始终各唱己调。这就是我的困惑,尽管我现在也讲国学,但如果有人问我“国学好不好”,我却不能做肯定答复。中国文化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百年来一直困惑着我们。如果说其他国家也存在文化的“我们是谁”的问题,那么中国尤为严重。为什么?因为很多国家的人虽然说不清自己的文化但却没有骂自己的文化,我们却在指责自己的文化。这是很少有的,所以我很困惑。但后来,我的同班同学程静宇(汪学群老师的母亲)写了一本书《中国传统中和思想》,回答了吴建民的问题。书中认为中和就是中和之道,是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中国的道统。这本50多万字的著作解答了我的困惑,五千年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不是封建主义,而是中和思想,这本书至少是值得大家讨论的。

20世纪80年代文化讨论的时候,我也参与其中。庞朴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大家之所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就是把两个概念搞混了,一个是传统文化,一个是文化传统。传统文化是中国五千年创造出的各种文化,外延很广泛,既有封建性的倒退也有积极的精华。但是这中间有一个核心价值观,就是文化传统。80年代时,我也搞不清,我们可以叫作集体无意识,大家都能感觉到它但

专 却说不出来;或者叫作民族魂,或民族精神,相对于西方可以称它人文主义——
论 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是宗教文化,唯独我们是人文的。人文主义是否就是王权
主义呢?那也可能,人文主义和王权主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儒教讲
求政治,实际上他(庞朴)还是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封建专制。其实这样分也
不错,至少认为中国文化中有好的东西,精华都在传统文化里面。后来李慎之说
庞朴这样分很好,然后写了一篇大文章讲文化传统就是专制主义,并且证明在历
史上它就阻碍着民族的发展。不只是李慎之,刘泽华、吴江等学者对此也很认
同。中国的文化传统就是道统。共产党的延安时期周恩来就讲过,中国的道统
就在经学里,就是封建阶级的统治思想。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化传统只能暂时如
此定性了。

以前,纪宝成等人在《光明日报》创办了“国学版”,2010年停办了,因为国
学的问题太多了,国学和改革开放的关系始终搞不清楚。国学究竟是好是坏?
中国传统文化是专制还是和谐?以前我和程静宇讨论过中和问题,后来为她的
新书《中国传统中和思想》写了一篇文章予以介绍。第一,本书把“中和”分为十
个方面,政治的、伦理的乃至文学的、艺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以中和思想贯穿,
这是有充分论证的。第二,本书从历史上纵观,中和思想由尧舜直贯明清。什么
叫中和呢?它的内涵很丰富,简单讲就是在对立中找综合平衡点。这是中国独
有的,不同于西方的单面主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
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讲,中和是一种战略思想,致中和,使中
和思想扩展开来就可以天位物育。中和思想后来归结为和谐,故宫有中和、太
和、保和三大殿,中和思想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国家民族核心的决策
依据。这里面有因果律,中国五千年文明,如果致中和,推行这一核心价值观就
会实现治世。“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如果能致中和,就是发而皆中天下太平。
李约瑟说,中国思想的妙处就在于和,好像一个调节器使一切趋向平衡。汤恩比
对比中西文化后也说,西方文化是爆炸型的,中国文化则是平衡型的、收敛的。
世界文明的发展,爆炸型文化已走到尽头,需要有平衡、收敛的文化来调节。通
过这些,我就特别关注了一个问题——中国模式。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影响了
全世界,但中国经济却始终保持平稳增长,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改革开放
三十年中国走过了西方两三百年的道路。这里面一定有中国模式的原因,而中
国模式一定有一个中国文化的根源。全世界都在讨论,可见“中国文化是什么”
不仅仅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的战略抉择问题——我们从哪儿来?未来的方向又
在哪里?

我们从“五四”到现在磕磕绊绊地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始终不知道中国文
化是什么。它究竟是专制还是中和?中国文化有没有道统?“五四”反道统,我
们现在要重建,但是按照什么思想重建?问题的关键在于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
文化,但是我思来想去,最佩服的还是侯外庐的思想。我们20世纪50年代——

中国第一批大学生——读大学时,侯外庐的书是必读的,是典范。直到现在我仍清晰记得我们当时学马列学新史学,当时的新史学分为两派。其中一种就是普遍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普遍且唯一的真理,马克思把历史分为五种社会形态,按照一定规律发展而来。新史学最早以郭沫若为代表,他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以后基本上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去套中国历史,像翦伯赞、吕振羽都是。我们发现当时侯外庐提出,尽管历史发展有共同的规律,但有不同的路径。中国和西方文明有不同的发展路径,中国从野蛮走向文明,用的是维新的方式,保留了血缘的脐带,这便产生了血统道统的问题。而西方文明的发展是革命式的,把血缘脐带斩断了。由此,中国和西方在走向文明的路径上便有根本性的差别。侯外庐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当时郭沫若、范文澜都没发现。我们耳目为之一新,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条路子。“五四”时期一些不用马列的人也注意过这个问题,像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但只是现象上的分析。侯外庐翻译了《资本论》,也关注过王国维的研究,得出中西文明不同的发展路径。保留了氏族结构的文化共同体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侯外庐先生引了王国维的话,指出氏族结构的文化包括四个方面:尊尊、亲亲、长长、男女有别。这便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和特色,“尊尊”和“亲亲”是氏族的亲族血缘关系自然而然形成的核心价值观。这保证了中国文化注重亲族、注重道德、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和希腊城邦制度差别很大。进而我们可以推问:“尊尊”和“亲亲”的宗法构成体例后面是否还有一个价值主义?“尊尊”和“亲亲”不是封建专制主义,专制主义和王权主义是把血缘脐带斩断之后才有的。后来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一篇陈谷嘉的文章《侯外庐关于古代文明路径说及其价值》,其中还引用了张岂之的观点。文章指出,侯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中国史的过程中发现中国文明从氏族社会走向文明社会,保留旧有的血缘关系去建立国家组织,可以称之早熟文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和这种血缘遗留有关,其后的宗法宗族力量就是从氏族血缘关系演变而来的。白寿彝先生说,外庐先生研究中国历史,总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说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民族化。这就说明,中国文化的源头是宗法,是血缘文化,而不是政治上的专制。当时谁都没发现,是侯外庐先生20世纪30年代探讨亚细亚生产方式时提出中国文明特有的路径的。中国文明的路径也就决定了中国思想的路线不是专制而首先是宗法——尊尊、亲亲、长长、男女有别。尊敬祖先和爱护子孙的结合就产生了一种凝聚力,从而形成了文化的骨骼。“尊尊”、“亲亲”和中和是什么关系呢?王国维指出:“尊尊”、“亲亲”产生文化的张力。张力即矛盾,如果过分强调“尊尊”就会尊而不亲,反之亦然。自从尧舜奠定文化共同体直至夏商周,夏代文化是亲而不尊,商朝是尊而不亲,周代是在“尊尊”、“亲亲”之间找一个结合点,但还是不及尧舜时代。尧舜时代是把“尊尊”、“亲亲”按照中和的原则安排得恰到好处,中和的原则就是大同,尊而不亲、亲而不尊的原则可称之为小康。

中国文化向来以大同为其最高理想,为了达到最好的状态,我们便找到中和。中国文化的特殊路径——文明在先,国家在后,所以中国文化早熟,正因为文明在先,宗法便成了文明的源头。因为国家在文明之后,所以文明的源头不是专制。希腊文明是一种智者气向,中国的文明则是贤者、圣人的气向。

这个问题特别重要。我提出来,是希望历史所的同志尤其是思想室的学者们好好研究。李学勤之前编过《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形成研究》,其中有文章写到国外的酋邦理论。谢维扬把这个理论搬到中国,五帝时代不是部落联盟而是酋邦,酋邦制就是专制主义,专制主义的源头很早就有。他出了一本书《中国早期国家》,我当时在研究“宗教·哲学·伦理”这一课题,就找来这本书读。我觉得这不对,把国外的理论照搬到中国,尧舜时代就是专制了。后来我就找到了李学勤编的书,第一篇是王震中写的,他说酋邦理论有点对,但不是普遍的,酋邦理论有贡献但也有局限。王震中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路径的‘聚落三形态说’”。中国古代绝不是酋邦,而是宗法共同体。宗法共同体就是侯外庐讲的文明早熟,是文化大于政治、引领政治。后来美国华裔学者张光直认为,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中国从氏族文明通过维新开发出的文化是连续性的原生的文化,西方文明是断裂性的次生的文化。中国文化更具有典型性,以前我们拿西方理论去套中国文化是走错了。魏特夫也指出,中国专制主义源自治理水患。综合来看,我们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不是专制而是和谐。

现在可以回答开头的问题了,这不再是单一的学术问题而是迫在眉睫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年,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又是三十年,从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文化战略。一方面,现在要追寻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而我们的精神家园在中国文化里,如果传统文化都是专制和糟粕就只能去国外寻找,但国外能找到我们的精神家园吗?这是所有中国人的矛盾,我们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经济上去了,文化却没有了。真正要发展文化了,却常常认识不够。文明路径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侯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到现在却没得到应有的重视。陈谷嘉写了《打开中国历史的秘密》,真正打开秘密还有很多事要做。现代中国已经实现现代化,那中国模式是不是有一个中国路径的问题?《光明日报》把“国学版”改成了“中国路径”,和武汉大学合办。现在他们也在找中国路径问题,这是可以和侯派建立共同体的。而且侯派的思想现在分裂了,有陈谷嘉的讲法也有刘泽华的讲法。刘泽华写了篇文章——《我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我很感动,他反思“文革”有切肤之痛。但是,反思错了,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我们的民族魂需要去塑造。目前,历史所思想室是最有希望的,最应该去重新反思我们的传统文化、重建我们的文化传统即道统。

(作者:余敦康,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本文系余常青根据录音整理)

中国史前文化中的符号与文字：文字的起源

◇王震中

在世界文明史中,尽管有些民族的早期文明尚未发明文字,如南美洲秘鲁的印加文明,虽已建立了强大的帝国式的国家,却没有文字的使用;中国古代匈奴等游牧民族中,有许多在其初期文明社会虽已建立了政权机构,却也没有文字。但是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主体民族——华夏族,是以文字为载体的伴有文字的文明民族。愈来愈多的考古发现表明,在漫长而灿烂的中国史前文化中,伴随着文明的起源,汉字的出现,经历了从符号到文字的发展过程。

一、仰韶文化中的陶器符号

虽说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唐兰先生依据瑞典人安特生在我国甘肃、青海地区辛店文化陶器上所发现的几种彩绘符号,探讨了中国文字的起源^①,但真正通过科学发掘的出土物来探讨文字的起源,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从西安半坡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符号。

半坡遗址位于黄河中游地区渭水流域的西安东郊,它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所确认的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时代最早的一类遗址,而且经过较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半坡遗址的发掘者对该遗址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图 1)的重要意义已有充分的认识,在《西安半坡》考古发掘报告的第五章《精神文化面貌》的第四节《陶器上刻的符号》里,将其所发现的 113 个刻划符号标本,按照笔画形状分类为 22 种,并指出了这些符号在



图 1 半坡遗址陶器上的符号

^① 1933 年,唐兰先生在为商承祚《殷契佚存》一书作序时,认为瑞典人安特生《甘肃考古记》里所载录的辛店陶器上的彩绘符号,是一种较古的文字,与商周文字属于一个系统。其后他又在 1934 年印刷的《古文字学导论》中重申了这一看法,并根据安特生的假定,把辛店期的年代定在距今 4500 年左右,由此推断“中国文字的起源,总在六七千年前”。

陶器上的刻划位置,统计了各种符号重复出现的次数,还“发现多种类同的符号,出在同一窖穴,或同一地区”,并进一步指出,“这种符号,在其他一些仰韶文化遗址中也有发现,其作风与作法完全相同”。最后,该报告写道:“总之,这些符号是人们有意识刻划的,代表一定的意义。……从我国历史文化具体的发展过程来说,与我们的文字有密切关系,也很可能是我国古代文字原始形态之一,它影射出我国文字发明以前,我们祖先那种‘结绳记事’、‘契木为文’等传说,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①

半坡遗址之外,类似于半坡的符号,先后在同一文化类型的陕西临潼姜寨(图2)、宝鸡北首岭、合阳莘野村、长安五楼、铜川李家沟、零口、垣头(图3)和河北永年台口村^②、甘肃王家阴洼、秦安大地湾(图4)等遗址都有发现,而且数量可观。据后来的统计,半坡遗址发现刻有符号的陶器和陶片为113件,符号27种;姜寨遗址发现129件,符号38种;李家沟发现23件,符号8种;大地湾发现32件,符号16种^③。这些符号有着相当固定的刻划习惯,它们主要见于涂有黑色带纹陶钵的口沿上,而且一器只刻一个记号(图5),陶符重复出现的频率较高,相同或相似的符号归并后可达50多种^④。半坡遗址的陶器刻划符号发表后,引起了古文字学家们的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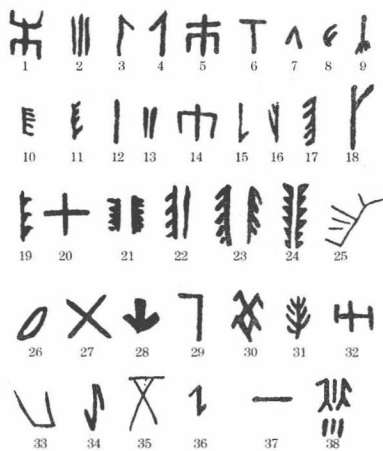


图2 姜寨遗址陶器上的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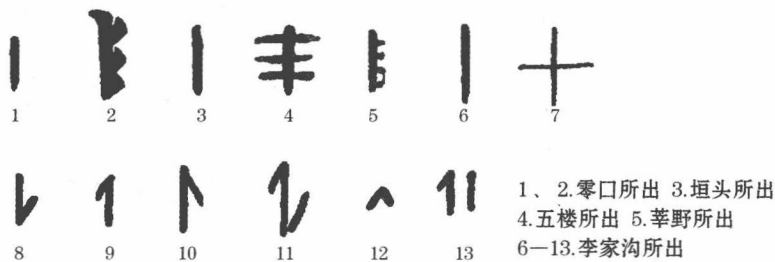


图3 零口、垣头、五楼、莘野、李家沟五遗址出土的陶器符号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第186页,文物出版社,1963年。

② 河北省文物局文物队:《河北永年县台口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12期。

③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第176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④ 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王蕴智:《史前陶器符号的发现与汉字起源的探索》,《华夏考古》1994年第3期。

符号	单位号	符号	单位号
	G300: P47、F245: P95、H334: P9、 F361: P5、H3101: P1、H379: P165、 G300: P37、H715、P12、TG4: P8	┐	G300: P56
└	G300: P46、H379: P164、T327: P6、 T320: P27	↓	T108: P1、H715: P3
└	G300: P48、G300: P45	∧	H235: P11
┘	T329: P8	↑	H3110: P3
┐	F202: P16、H379: P163、T327: P27	ㄣ	F709: P15
┐	T340: P48	ㄣ	T314: P2
┐	F602: P9、H7: P1	ㄣ	T7: P5
	F245: P6	ㄣ	H235: P13

图4 大地湾第二期陶器符号及出土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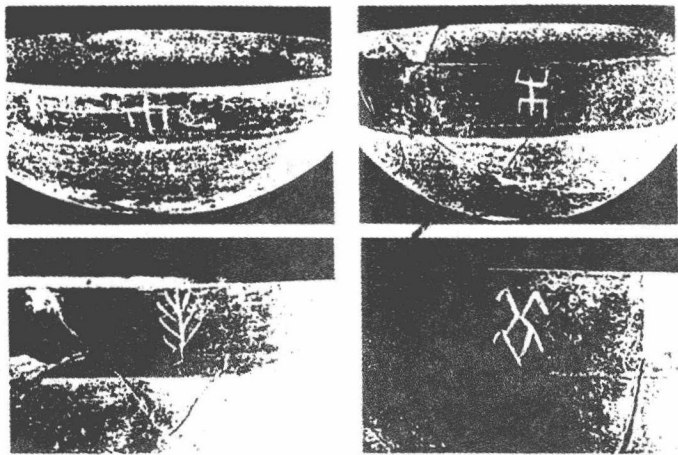


图5 姜寨出土的陶钵与符号

在国内第一个发表文章予以研究的是郭沫若先生^①。郭沫若先生认为半坡彩陶上的刻划，其“意义至今虽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押或者族徽之类。我国后来的器物上，无论是陶器、铜器，或者其他成品，有‘物勒工名’的传统”。“彩陶上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半坡遗址的年代，距今有6000年左右。我认为，这也

①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就是汉字发展的历史”。郭沫若先生还依据半坡的发现,结合其他出土资料、现存民俗和文献记载,认为“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与象形两大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

郭沫若先生有关“花押”、“族徽”、“物勒工名”的看法,显然与半坡遗址的发掘者依据多种类同的符号出在同一窖穴或同一地区而推测“这些符号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的专门记号”的认识是一致的。而郭沫若“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的见解,也显然首先基于笼统地认为半坡之类的符号属于指事系统,半坡遗址在年代上又属于当时发现的新石器文化中最早的一类遗址,这样,从实证的角度着眼,指事先于形象也就有了事实根据。然而,在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发表不久,于省吾先生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①,依据于先生的考释,半坡出土的陶器上的刻划,既有指事系统的文字,也有象形和假借系统的简单文字,如于先生所释的“五作×,七作+,十作|,二十作||,示作T,玉作,矛作,作,阜作”等字中,玉、、阜之类就属于象形字,而五、七之类的记数文字,多数古文字学者都认为是假借字^②。此外,于省吾先生还强调说:“不难设想,当时的简单文字不会也不可能只限于陶器上,陶器之外,自然要有更多的简单文字,只是我们现在还看不到罢了。这种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学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仰韶文化距今有6000多年之久,那么,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也就有了6000多年之久,这是可以推断的。”

面对史前陶器上的刻划等材料,在研究汉字的起源及演变时,一个值得重视的方法就是把这些史前刻划等材料与甲骨文、金文进行比较和联系。这是因为,大凡实证性的研究,每每都是从已知出发去推测未知。台湾学者李孝定先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表的一系列论文^③,在力主仰韶等文化的刻划符号是文字的同时,亦对中国文字的发生和演变的过程作了较详细的分析。李孝定先生对中国文字发生和演变过程的推测正是以对甲骨文的“六书”分析为支点的。所谓“六书”亦称为“六义”,它是前人研究汉字发生演变等错综复杂的现象时而归纳的6种造字法则。依据李孝定先生的统计和分析,在甲骨文里,一是没有发现转注字;二是假借字所占百分比颇高,而假借字里,除了极少数可疑,或可另作解

① 《文物》1973年第2期。

② 记数文字中一、二、三、四,甲骨文作一、二、三、四,多数学者都认为是指事字;五、六、七、八、九、百、千、万等记数文字,则多认为是假借字。

③ 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和有史早期陶文的观测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南洋大学学报》1969年第3期;《中国文字的原始与演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五本第二分、第三分,1974年;《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本第三分,1979年。

释外,所借用的字,都是象形、指事或会意字,绝没有一个形声字;三是与后世的《六书爻列》、《六书略》等“六书”分类的统计数字比较,形声字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有显著的大量增加。对于这些现象,李孝定先生解释说这是因为当时还处于形声字初期,所以在这以前大量使用着的假借字仍然在流通。关于形声字的产生,李先生认为是在假借字上添加一个与假借义相近的形符,以表示那个字的属性而产生了原始形声字,即以原来的借字作声符,再加注形符而形成了最原始的形声字。形声字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一大突破,并成为后来汉字发展的主流。为此,李孝定先生在郑樵《六书序》“六书者,象形为本”以及唐兰《古文字学导论》所主张的“三书说”的基础上,将中国文字的发生与发展亦划分为“以表形文字为最早,表意文字次之,表音文字又次之”这样三个阶段,并用“六书”分类的方式,列表如下^①:

分 组	表形文字	表意文字	表音文字
次 第	画面 ↓ 语言	(加记号) 指事 ↓ (加象形) 会意	(借音) → (借音) → (注音) 假借 → 形声 ↓ (借音) → 转注

在对甲骨文作六书分析的基础上,李孝定先生对史前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也作了六书分析。他认为,“在六书中,五、六、七、八、九等记数文字,属于假借,假借是借用已有的文字,代表无法造出本字的语言,在六书次第中,位居象形、指事、会意之后,半坡时代已有属于假借的记数字,这证明在那以前,汉字应已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发展历程”^②。关于象形、会意方面的文字,李孝定认为姜寨陶文中的“𠂔”是“‘岳’字,应属会意;三门峡陶文中的‘𠂔’,是‘𠂔’字,属象形”^③。这样,应用六书理论,李孝定先生认为仰韶文化中的陶器符号里有象形、会意、假借等方面的字而无形声字,完全符合文字发生与演变的规律,它们和甲骨文字属于完全相同的系统,是中国较原始的文字。

在李孝定先生的六书分析中,有关形声字是受假借字的启发才产生的论述颇为精辟,他的这一说法将传统的假借位于形声之后的六书排列方式改变为假借位于形声之前,笔者以为是合理的。至于象形是否一定先于指事等而产生,亦即在形声字出现之前,中国文字的起源是否一定是由图画到象形,再到指事、会意、假借,显然与郭沫若先生提出的“指事先于象形”的说法一样,仅靠仰韶及其

① 李孝定:《中国文字的原始与演变》(下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五本第三分,1974年。

② 李孝定:《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本第三分,1979年。

③ 同上注。